

袁宏道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袁宏道

●李
鸣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8·大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郭预衡,侯光复主编, -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4

(月亮文库/康琳,侯光复主编)

ISBN 7-80612-467-5

I. 中… II. ①郭… ②侯…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205 号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全 11 册)

郭预衡 侯光复 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字数:27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3 插页 55

印数:0 001~8 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文彦 责任校对:刘青 宋丽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意设计中心 陈正平 程萍

ISBN7-80612-467-5/I·70

登记号:(辽)第 15 号

定价:198.00 元(全 11 册)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主 编	郭预衡	侯光复
常务副主编	康 琳	
责任编辑	许文彦	
装帧设计	羽 人	
插图绘画	王国能	

《左 周》卷	张文湫	选注
《司马迁》卷	黄 涛	选注
《韩 愈》卷	洪祖斌	选注
	尹 江	
《柳宗元》卷	阿忠荣	选注
	张廷银	
《欧阳修》卷	萧 放	选注
《曾 巩》卷	陶文鹏	选注
《王安石》卷	齐石宜	选注
《苏 轼》卷	李真瑜	选注
	田南池	
《归有光》卷	赵伯陶	选注
《袁宏道》卷	李 鸣	选注
《集外卷》卷	韦凤娟	选注

前 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散文创作而闻名的大家不少。其中可称祖师者，有先秦的庄周、汉代的司马迁；可称大家者，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轼。唐宋以后，可同大家比肩者，有明代的归有光；可与大家抗衡者，有晚明的袁宏道。其作品或汪洋恣肆，或生动传神，或逻辑严密，或文采横溢，均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这十位大家散文创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11卷11册，选编了这十位散文家的全部经典之作。其中，《集外卷》还汇集了自先秦至清末除此之外其他作家的散文精品。若以单卷论，本书收入了中国古典散文十大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古典散文创作的全部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各个时期散文艺术最高成就的佳作名篇。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创新。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散文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篇文章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写作背景和作品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该散文家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创作简表”和“散文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路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该散文家的其他选本或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散文作品大多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除庄周、司马迁和王安石以外,每个散文家的作品都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篇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作家们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去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袁宏道的 生平与 散文创作

袁宏道是明代后期杰出的文学家，由他倡导的“公安派”，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一个文学流派，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成为明代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人。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出生。自幼即聪明颖异，在私塾读书时，对当时作为仕进敲门砖的八股文即已熟练精通。十六岁为诸生时，结文社于公安城南，自为社长，社中三十岁以下的人都听其

约束。这时他已广泛涉猎诗古文词，作品也已结为诗集，显露出了不同寻常的文学天赋。二十一岁中举，次年赴京参加会试，未能及第。在北京通过已在京为官的兄长袁宗道结识了焦竑等在思想界有一定影响的王学左派人物，初步开始了对王学左派思想的接触。二十四岁时，袁宏道曾到麻城（今湖北麻城）向旅居该地的李贽问学。李贽是万历年间反理学、反传统的怪杰，思想犀利深刻，行为惊世骇俗，袁宏道一见之下，大为倾倒，“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归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万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郎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进士及第，因未选官，暂时还家闲居。这期间他同告假在家的袁宗道一起精研性命之学（禅学），并同至龙潭湖拜访过李贽。李贽对二人极为欣赏，对袁宏道更是寄予了厚望，认为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行状》）。这段时间，奠定了袁宏道的思想基础。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入京谒选，被任命为吴县知县。他在知县任上取得了有口皆碑的政绩，但他清高脱俗的禀性使他无法忍受县令繁剧而庸俗的日常政务，他

在给友人的信中反复诉说着任这一职务的苦处：“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丘长孺》）这是其任县令时真实的感受。不久，他以患疟疾及庶祖母病重为借口，连上七封文牍请求辞职。上司极力挽留，但未能动摇其渴望摆脱束缚的决心，终于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底获准离职。袁宏道初登仕途的经历就这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结束了。在吴县期间，袁宏道首次对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复古派发难，并提出了自己的创作口号和理论，得到了江盈科、陶望龄等人的赞许和响应。袁宏道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对其理论进行了具体实践。

离职后获得自由的袁宏道移家无锡，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应陶望龄之约赴杭州，开始了数月的漫游，足迹遍及越中名胜，并进入徽州，沿新安江返回杭州。在此期间袁宏道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和山水诗，是其前期创作的一个高峰。

万历二十六年（1598）秋，袁宏道应其兄宗道之召，赴京候调，改授顺天府学教授。次年三月，升为国子监助教，二十八年（1600），又升任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在这两年时间中，袁宏道细致研读了宋代诸大家尤其是欧阳修和苏轼的诗文，用对欧、苏的推崇来否

定复古派诗宗李杜、文宗秦汉的观点，继续其反对“七子”的努力。但这时他的心境已不像原先那么发扬踔厉，而是渐趋沉潜，认识到了以前的创作过于粗率随意，在创作中加强了对精致含蓄的追求。在对性命之学的研修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发现李贽学说过于强调“悟”，而忽视了“修持”，易于养成自我放纵的习气，于是转为强调修持，“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行状》）这是对李贽学说的超越，是一个有着独立而高超的见识的人的自我修正。总之，在思想上和文学上，这两年都是袁宏道的一个转折时期。

万历二十八年（1600）七月，对仕途又感厌倦的袁宏道再次告假还乡。九月，在京任太子东宫讲官的袁宗道因病去世。这是对袁宏道感情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先生感念，绝荤血者数年，无复宦情。”（《行状》）于是袁宏道隐居公安城南柳浪湖，在游览和谈禅静修中度过了六年。

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在老父的催逼下，袁宏道入京补官，仍任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开始了第三次仕官生涯。三十六年（1608）春，以清望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擢行吏部文选司事。在任设法惩治了把持铨选的猾吏，并制定了年终考察书吏之法，对朝廷弊政有所改革，充分展现了其政治才华。万历三十七年（1609）八月，任陕西乡试主考

官，恪尽职责，所录取多为当地知名文士。归途游华山、嵩山，撰有《华嵩游草》二卷，是后期创作的一个高峰。“所著游记及诗，浑厚蕴藉，极一唱三叹之致，较前诸作，又一格矣。”（《行状》）

万历三十八年（1610）春，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假归里，定居于沙市，筑室名砚北楼，绝意仕进。至八月患热病，未能有效治疗，于九月初六日去世，年仅四十三岁。

二

袁宏道是一个不热衷仕进的人，他前后共三次出仕，加起来的时间不过五六年，每次都是因厌倦而告归。但尽管仕官生涯与其本性相冲突，他还是努力地尽了自己的职责，并不像一些名士那样疏狂自放，不理政事。在吴县，他就已显示出了精明干练的政治才华，“才敏捷甚，一县大治，宰相申公闻而叹曰：‘二百年来无此令矣！’”（《行状》）在吏部，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弊政，惩治猾吏，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一致赞赏。这些都说明了其政治才能的卓越，但他终于还是不乐仕进，认为“登山临水，终是我辈行径”（《答小修》），保持了其一介书生的本色。

对性命之学的钻研和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构成了袁宏道生活的主要内容。钻研性命之学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对此袁宏道是始

终不懈的，而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则成为其生命的外化形式。这样清雅脱俗的生活所映照出来的那种超然和澹泊，是袁宏道人格魅力的主要方面。

袁宏道对现实政治是关心的，但并不像某些论者所强调的那么热切。在一个承平日久的社会，人们安居乐业，政治热情是不高的；而当人们普遍对政治表示关切的时候，恰恰说明那时的社会出现了大的弊病。袁宏道对矿税表示了意见（《答沈伯函》），是因为矿税扰民严重；对吏部铨选表示愤慨，对国势表示担忧（《上孙立亭太宰书》），是因为这时政治状况已经很恶劣了。这些都足以体现出其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在万历前期相对太平的世道下，文人的兴趣集中在对哲学和文学等精神文化的钻研上，本是一件再也自然正常不过的事。

袁宏道的文学思想是通过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的抨击而体现出来的。

明代诗文有过两次复古运动，第一次在弘治、正德年间，由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所倡导；第二次在嘉靖、隆庆年间，由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所倡导。“前七子”的复古，起初是为了纠正程朱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反对粉饰太平、虚浮靡弱的“台阁体”诗文，有一定的革新意义，但逐渐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发展到“后七子”，复古派的声势渐趋浩大，他们提

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唐代宗年号）以后书勿读”的口号，把复古的理论推向了极端，流弊所及，是对古人的剽窃摹拟之风盛行，诗歌争作盛唐的豪言壮语，文章力追秦汉的古奥难解。这种摹拟流风的弊病在于使人丧失了创造性和个性，从而也使文学丧失了生命力，许多有个性、有才华的文人都被淹没在这股卑俗的洪流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宏道对复古派展开了激烈的抨击。

袁宏道对复古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调要正确理解文学与时代、古与今的关系。他指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江进之》）“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雪涛阁集序》）认为文学作品因时而异，在形式上随着时代而发展。“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丘长孺》）这是一种进化的文学史观。他还从逻辑上论证了一味复古的荒谬性：

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

与这种进化的文学史观相关的，是对摹拟的反对。他在《诸大家时文序》中说：

且公所谓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极矣。何也？优于汉谓之文，不文矣；奴于唐谓之诗，不诗矣；取宋元诸公之馀沫而润色之，谓之词曲诸家，不词曲诸家矣。大约愈古愈近，愈似愈贗，天地间真文渐灭殆尽。

他对复古本身并没有进行苛刻的指责，他所最为不满的是剽窃摹拟对文学生命力的扼杀。在《雪涛阁集序》中他说：

夫复古是矣，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词。有才者拙于法而不敢自伸，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驹子，皆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

这些言论对摹拟的弊害剖析得非常清晰，他指责摹拟所得的诗文是“假骨董，贗法帖”（《诸大家时文序》），尖刻地道出了摹拟文学的实质。

在抨击复古派的同时，袁宏道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即“性灵说”，“性”指个性、性

情，“灵”指心灵，即意念和感受。他要求创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要“信腕直寄”（《叙曾太史集》）、“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强调的是不假雕饰地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对性灵的抒写是以感情的真实为基础的，袁宏道理论的中心是“真”，对“真”的追求是对复古派“假骨董、臆法帖”式的创作的最有力的冲击。他反复指出：“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貌乎？”（《丘长孺》）提倡“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的创作态度。用自然平易的文风来表达真实的感情，这是袁宏道为扭转文坛风气而开出的—帖对症下药方。

强调对民间歌谣的学习和对俗文学的重视，也是袁宏道进化的文学史观的一个方面。民歌是活文学，富有生命力，袁宏道予以了相当的重视，“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在与袁宗道的书信中，他说：“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擘破玉》为诗，故足乐也。”（《伯修》）对民歌的喜爱和学习与其对真性情的强调是相关的。他还对《水浒传》、《金瓶梅》等俗文学表示了极大的赞赏，把关汉卿和罗贯中与司马迁相提并论

(《龚惟长先生》)，这与其文学思想是一贯的。

袁宏道对复古派的抨击切中了要害，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袁宏道对此也颇为自得，他在《答李元善》中说：“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韩、欧之极冤，捣钝贼（指王世贞）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亦弟得意事也。”对于袁宏道的功绩，钱谦益在其《列朝诗集小传》中给予了充分的评价：“中郎之论出，而王（世贞）、李（攀龙）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复古派的破坏性工作完成后，随着自身思想学养的提高和年龄的渐长，袁宏道开始对自己的理论有所反思。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致黄辉的书信中，他谈到：“诗文之工，绝非以草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为近道也。”（《黄平倩》）认识到了抒写真性情还须有相应的艺术手段，强调了艺术性的作用。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致袁叔度的书信中，他表示：“至于诗文，乖谬尤多，以名家为钝贼，以格式为涕唾，师心横口，自谓于世一大戾而已。”（《袁无涯》）虽然是谦虚之词，但不难看出作者的反省之意。袁宏道自己的作品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由早期的浅率平易而变为晚期的深沉含蓄，这

是其对艺术追求的过程。袁中道《花雪赋引》中说：“予兄中郎操觚即不喜近代人诗，由浅易而深沉，每岁辄一变。往年自秦中主试归，语予曰：‘我近日始知作诗，如前所作，禅家谓之语忌，十成不足贵也。’”于此可见袁宏道对自己诗文的想法及其晚期文学思想之一斑。

袁宏道的“悔其少作”，与对公安末流的担忧也不无关系。据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称：“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少时偶尔率意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譬如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乌焉三写，必至之弊耳，岂先生本旨哉！”袁中道又说：“未有中郎之才、之学、之趣，而轻效其颦，似尤不可。何者？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情虽无所不写，而亦有不必写之情；景虽无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色泽理贵乎相宜。”（《答须日华书》）对抒情（内容）与艺术手段（形式）的关系讲得很透彻，对东施效颦者的指责也很尖锐，可视为对袁宏道晚期文学思想的精确的诠释，对于这些，在评价袁宏道的文学思想时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三

袁宏道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时人更注重于他的诗，但在